

1928年中國古代名畫渡日風波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Troubles about Japan ' s Borrowing of the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Paintings from China for the Grand Exhibition in 1928
著者	邱吉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15
page range	487-501
year	2022-03-31
URL	http://doi.org/10.32286/00026571

1928年中國古代名畫渡日風波

邱 吉

The Troubles about Japan's Borrowing of the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Paintings from China for the Grand Exhibition in 1928

QIU Ji

Between 24th November and 20th December, 1928,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nd the Ministry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宮内省, Kunai-shō) held the exhibi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ang,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t Tokyo Metropolitan Art Gallery and Tokyo Imperial Household Museum.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use the archives, the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relative critical articles, and the group list of exhibitors, etc., which preserved in the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n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exhibition of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sorts out the history of the viewing, research and transfer of *The Thirteen Emperors Scroll* attributed to Yan Liben (c. 600-673).

Keywor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cords; The Exhibi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Tang,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hinese Pain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Centr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The Thirteen Emperors Scroll*

關鍵詞：外務省記錄、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中國畫學研究會、古物保存會、《歷代帝王圖》

前言

1928年11月10日，日本為昭和天皇裕仁舉行了一系列加冕儀式，被稱為「昭和大典」。為了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和向世界宣揚國家主義，「昭和大典」與此前的天皇簡單的加冕典禮不同，日本政府把它辦成了極為富麗堂皇、史無前例的國際盛典。作為慶祝昭和天皇加冕的活動之一，1928年11月24日至12月20日，日本外務省與宮内省在東京府美術館和東京帝室博物館舉辦了「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以下簡稱唐宋元明展）¹⁾。該展覽共展出600多件中國古代名畫，其中有一半的作品借自中國的私人收藏家。

1) 該展覽會又被稱為「支那古名畫展覽會」。

然而，唐宋元明展的舉辦可以說經歷了一波三折。展會籌備之初，日方曾派人兩度訪華商借展品。展品運往日本時，卻又遭到了民國海關的截留和眾多民國人士的反對。久世夏奈子曾用「文化外交」的視角對該展覽會做了宏觀考察，指出該展覽是國民政府北伐確立新體制之後，中日複雜的外交背景下官民利益一致的產物²⁾。本文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唐宋元明展關係檔案、中日的新聞報刊報道等資料為中心，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對古物保存會及其反對運動、中國古代名畫流出的個案考察等未提及的問題進行補充和驗證，進一步探究1928年中國古代名畫渡日的始末。

一、唐宋元明展的緣起與籌備過程

1920年代是中日關係較為緊張和動蕩的時代，然而這也是中日美術交流最為活躍的時期。例如，1921至1931年之間曾經舉辦過7場大規模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³⁾，這一系列的聯展是中日美術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⁴⁾。在唐宋元明展之前，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為宗旨的中國畫學研究會聯合日本藝壇共舉辦了三次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⁵⁾。1926年第四次聯展之時，誕生了一個中日結盟的藝術團體—東方繪畫協會。該協會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1925年2月上海日商所屬紡織工廠工人罷工波及青島，5月29日發生了「青島慘案」，5月30日上海南京路英國人警官擊殺群眾，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全國各地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排外運動。迫於國際輿論的壓力以及西方文化的壓迫⁶⁾，日本文藝界決定聯合中國文藝界，將中日聯展的組織名稱變更為「東方繪畫協會」。

據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1862-1940）《十三松堂日記》（第一卷）記載：「（前略）六月二十四日，中午開始在精養軒與金城、周肇祥二人以及日本發起人外務省文化部長岡部長景會面，商討東方繪畫協會成立之事（筆者譯）」⁷⁾。1926年7月2日，正木直彥與周肇祥（1880-1954）、小室翠雲、橫山大觀、竹內棲鳳等中日代表在華族會館召開會議，由正木起草了中日雙語的東方繪畫協會章程⁸⁾。章程詳細內容如下：

第一條：本會之名稱為東方繪畫協會。

-
- 2) 久世夏奈子，〈外務省記録にみる「唐宋元明名画展覧会」(一九二八年)〉，《日本研究》2014年第50號，頁143-189。
 - 3) 七場「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分別是1921年第一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2年第二回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1924年第三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6年第四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28年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1929年第五回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1931年宋元明清名畫展覽會。
 - 4) 鶴田武良，〈日華（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について：近百年來中國繪畫史研究七〉，《美術研究》2004年第383號，頁1-33；戰曉梅，〈金城と一九二〇年代の北京畫壇〉，瀧本弘之編《民國期美術へのまなざし：辛亥革命百年の眺望》（アジア遊學146，2011年），頁11-31。拙作，〈從外務省記録看日華古今繪畫展覽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20年第13號，頁415-431。
 - 5) 1920年5月，中國畫學研究會在時任大總統、能書善畫的徐世昌（1855-1939）的支持下成立，是兼有畫會和藝術教育性質的繪畫社團，培養了一大批青年畫家。其主要創辦人有金城、周肇祥、賀履之、陳師曾、蕭謙中、陳漢第、徐宗浩、陶瑤、胡佩衡等。
 - 6) 鄭工，《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代化（1875-1976）》（廣西美術出版社，2001），頁157。
 - 7) 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第1卷）（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5年），頁406。
 - 8) 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第1卷），頁408。

第二條：本會係華日兩國畫家合同而設，以東方繪畫之研究發達為目的。

第三條：本會職員之設置如下：會長二人，副會長四人以內，幹事四十人以內。

第四條：本會內設華日兩部，各部前條職員外於必要時得置其他職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正會員及特別會員二種，其資格由本會各部幹事會認定之。

第六條：本會應辦事業如下：一、繪畫展覽之開會。二、兩國畫家藝術上往來及考察。三、其他關於東方繪畫研究發達之事。

第七條：繪畫展覽會每隔一年開會一次，輪流在兩國都市舉行之。

第八條：本會經費之交付於共同籌得之款，華日兩部折半用之。

第九條：本會事務所暫定所開地方。北京、東京。⁹⁾

中國發起人代表是金城（1878-1926）和周肇祥 2 人，日本發起人代表為正木直彥、川合玉堂、橫山大觀、小室翠雲、竹內棲鳳、山元春舉、渡邊晨畝（1867-1938）等12位日本畫壇的重鎮。第四次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結束後，1926年9月6日，金城從日本返回北京途中因病客死上海。金城死後，以牧野伸顯、岡部長景、大村西崖、渡邊晨畝、澀澤榮一、山本悌二郎、村山龍平、本山彥一等政治界、美術界、財經界、媒體界名流分別在東京和大阪召開了金城的追悼會。為了表彰金城在東亞藝術的發展以及中日藝術交流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日本政府授予其「勳三等瑞寶章」¹⁰⁾。同年12月，徐世昌當選東方繪畫協會中國支部會長，汪大燮、熊希齡當選副會長，幹事為周肇祥、顏世清、陳漢第、江庸、陳年、凌文淵。1927年2月，日本方面在華族會館召開會議，選舉清浦奎吾為東方繪畫協會會長，幹事為正木直彥、橫山大觀、川合玉堂、荒木十畝、小室翠雲、結城素明、都路華香、下村觀山等13人。

東方繪畫協會原本預定於1927年春季在中國召開第五次日華繪畫聯合展覽會，由於1926年金城死後中國畫學研究會由周肇祥擔任會長，該會開始走向分裂，第五次聯展因此亦未能如期舉行。周肇祥，字嵩靈，號養庵，又號無畏，退翁，浙江紹興人。周曾任北洋政府官員、古物陳列所第四任所長，他為官日久，生性孤傲，待人刻薄，更是喜好獨斷專行。第四回聯展開幕時，周肇祥對一同赴日的錢瘦鐵、吳仲熊以及金城弟子惠孝同、金城之子金開藩等年輕人選印的展會宣傳圖片甚為不滿：「惜日前選印時，一任諸少年為之，未能慎擇，頗多幼稚之作」¹¹⁾。訪日期間，周與金城子弟多有齟齬，數次表達了對他們這些年輕人學識淺薄的的不滿，這也為金城死後中國畫學研究會的內訌和分裂埋下了伏筆¹²⁾。1927年1月金開藩成立湖社畫會，開始了與周肇祥的對立。1927年11月，正木直彥、渡邊晨畝、溝口禎次郎、田邊碧堂、北浦大介等人前往北京調停金開藩與周肇祥之間的矛盾，最終以失敗告終¹³⁾。由於金、周之間就中日聯展的中方主導權問

9) 〈大正十五年十月 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 附會員金紹城死亡關係》，頁0032-0035，Ref：B05015959400（國立公文書館）。

10) 〈大正十五年九月 東方繪畫協會會員金紹城上海ニ於テ客死ニ関スル件〉，《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 附會員金紹城死亡關係》，頁0015-0024，Ref：B05015959300（國立公文書館）。

11) 周肇祥，《東游日記》（京華書局，1926年），頁9。

12) 張濤，〈中國畫學研究會與金城、周肇祥關係考〉，《中國美術》2017年第3期，頁31。

13) 鶴田武良，〈日華（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について：近百年來中國繪畫史研究七〉，頁5；正木直彥赴北京交涉的經過，詳見《十三松堂日記》（第2卷），頁525-543。

題未達成協議，1928年3月，東方繪畫協會東京本部決定延期舉行第五次繪畫聯。1928年11月「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替代原本計劃1927年春季召開的第五次展覽，在東京府美術館舉辦。

實際上，早在1927年11月渡邊晨畝來訪北京之時就已經將唐宋元明展的籌備提上了日程。據《順天時報》記載：

一行留京之期，約有十日，期間並遊覽京中及近郊各名勝，中國各名士多設宴歡迎。其先于正木校長一行來京之渡邊晨畝畫伯，於該協會各要務外，並負有其他種種要務。據其對往訪之記者所談，此次來京計有三項任務：(一)繪畫展覽會(第五次中日聯展)、(二)書道振作會、(三)名畫展覽會(唐宋元明展).....名畫展覽會乃由東方繪畫協會舉行，其展覽之名畫，乃集唐宋元明四朝逸品，在東京美術館開展覽會，並蓋製作逸品原色版，俾將東洋美術權威介紹給世界各國，其印出裝成之繪畫冊亦擬廉價販售，會期定於來年六月，北京方面亦不少四朝逸品，如故宮博物院文華殿所藏名品極多，此亟擬求政府當局與以方便，俾此舉之獲成功雲。¹⁴⁾

從以上記載可知，唐宋元明展的籌備作為渡邊來訪北京的任務之一，為了將「東洋美術」的權威介紹給世界各國，他們希望蒐集唐、宋、元、明四個朝代的名畫在東京展覽，並且出版原色圖錄。此外，日方還希望通過北洋政府當局借調清室「故宮博物館文華殿」的繪畫藏品。然而原本預計1928年6月舉行的唐宋元明展並沒有如期舉行，據1928年2月1日的日本《報知新聞》報道，為紀念當年秋天的「昭和大典」¹⁵⁾，決定蒐集中日繪畫的精華之作於東京府美術館召開一個大型展覽，此舉得到了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的讚同和協助¹⁶⁾。

為推進唐宋元明展的準備工作，1928年3月28日，正木直彥前往外務省與岡部長景、坂西利八郎(1871-1950)、渡邊晨畝、岩村成允等商議展會事宜並主要達成了如下協議。1、唐宋元明展表面上不作為東方繪畫協會的事業，盡可能由日方掌握主導權，主要由同協會的相關人員運營。2、展覽會的委員會設置在日本，中日的相關人員作為該會贊助人。3、展覽會日期定在本年11月20日前後，大約展覽三週。會場定在東京府美術館。3、派遣坂西、渡邊二人以及同行名畫家前往中國出差2個月。4、以此為契機進行中國現存美術品名作調查¹⁷⁾。從以上協議可知，大概出於對東方繪畫協會北京本部周肇祥和金開藩之間主導權矛盾難以協調的顧慮，雖然東方繪畫協會名義上不作為主辦團體，但是日本方面仍然想獲得展會的主導權。1928年5月5日，外務省通過了貴族院議員坂西利八郎、畫家渡邊晨畝二人訪華的經費資助方案，決定從「對支文化事業」的經費中資助每人2000日元，以弘揚「東方美術」為名，預計5月中旬前往中國大

14) 〈中日藝術家大聚首，昨午中央公園之盛宴，繪畫協會之日名人先後來京，中國會員汪大燮等昨特招待宴〉，《順天時報》(1927年11月10日)，收錄於《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 附會員金紹城死亡關係》，頁0076。

15) 「昭和大典」是指1928年11月10日昭和天皇的加冕儀式。

16) 〈竹の台に日支美術の粹 大禮を壽ぐ大展覽會〉，《報知新聞》(1928年2月1日)，收錄於《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 附會員金紹城死亡關係》，頁0088。

17) 〈東方繪畫協會關係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ニ關スル打合會狀況概要〉，《東方繪畫協會關係一件 附會員金紹城死亡關係》，頁0093-0094。

連、旅順、天津、北京、青島、上海等地進行為期2個月的出展交涉¹⁸⁾。

視線回到中國，從1928年4月開始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轟轟烈烈的北伐時期。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經過山東濟南時與山東日本駐軍發生衝突，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濟南慘案」之後，中國南方進而開始了抵制日貨的排日運動，反日氛圍再一次瀰漫整個中國。中日緊張的國際局勢致使坂西和渡邊的無法按計劃訪華，為了更順利的進行出展交涉，日本外務省決定增派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結城素明（1875-1957）一同訪華，並於5月19日通過了結城素明1000日元經費的方案¹⁹⁾。結城素明是著名日本畫、西洋畫畫家，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曾數次參加中日聯展，與中國美術界交往密切。

二、訪華與出展交涉

據渡邊晨畝的訪華報告記載，日方曾兩次前往中國進行出展交涉。第一次從1928年5月30日至8月3日。第二次從9月下旬至11月上旬（第二次僅坂西利八郎和渡邊晨畝二人訪華）。一行人歷經大連、旅順、天津、北京、青島、上海等地，遊說當地名流、政治家、學者、收藏家、紳商等出展。如上所述，日本曾希望借調「故宮博物院文華殿」的藏品，然而由於時局的動蕩，故宮博物院在專業人員和經費上緊缺，內部龐雜的文物疏於整理，各項業務難以順利展開。1928年6月8日，國民政府北伐軍隊進入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被國民政府接收，6月18日，國民政府任命時任上海國立勞動大學校長的易培基（1880-1937）為「接收北平故宮博物院委員」，然而易培基因病不能北上，在6月21日電請沈兼士、馬衡（1881-1955）、俞同奎、蕭瑜、吳瀛五人代為辦理接收文物²⁰⁾。

渡邊一行於6月18日至7月6日來訪北京，拜訪了劉驥業、郭葆昌、金開藩、關冕鈞、熊希齡、汪大燮、周肇祥、廉泉、顏世清等人。雖然渡邊一行表面上與北京的藏家、名流、政要等出展交涉順利，但是北京城內也逐漸出現了反對和抵制出借藏品的聲音，甚至有人散播反對舉辦唐宋元明展的傳單。7月3日，渡邊一行設宴款待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馬衡和沈兼士（1887-1947）等人。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馬衡曾擔任古物館副館長，此後他一直在故宮從事古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從中方贊助人統計結果來看（表1）²¹⁾，馬衡與沈兼士等故宮博物院管理人員雖然同意作為唐宋元明展的贊助人，但是他們並未出借展品，據此推測渡邊一行借調故宮藏品的交涉應該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

18) 〈貴族院議員坂西利八郎、畫家渡邊晨畝兩氏ニ支那視察手當支給ニ關スル高裁案〉，《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014，Ref: B05016016400（國立公文書館）。

19) 〈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結城素明氏ニ支那視察手當支給ニ關スル高裁案〉，《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026，Ref: B05016016400（國立公文書館）。

20) 北京博物館學會，《北京博物館年鑒》（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頁6-7。

21) 表格數據整理自〈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贊助人名簿〉，《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172-0179，Ref: B05016016500（國立公文書館）；久世夏奈子，〈外務省記錄にみる「唐宋元明名画展覽會」（一九二八年）〉，頁143-189。

表1 中國贊助人及出展數量統計（北京）

贊助人	履歷	出品數量
閻錫山	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司令、山西都督	
王士珍	前陸軍部總長	
汪大燮	前國務院總理兼財政部總長	
熊希齡	前國務院總理、前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	
莊蘊寬	前審計院院長	
蔣作賓	前參謀本部次長	
胡惟德	前內務部總長	
易培基	上海國立勞動大學校長	
顧維鈞	前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寶熙	參政院參政	
朱益藩	溥儀之師、書法家	6
袁勵準	輔仁大學教授	9
貢桑諾爾布	蒙藏院總裁	4
闕鐸	前司法部總務廳長	
柯紹忞	前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長	
王樹枏	前新疆布政使	
江瀚	國立北平大學代理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	1
王式通	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長、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	
江庸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	
關冕均	前京綏鐵路局長、收藏家	33
郭葆昌	故宮博物院委員	8
熙鈺	前清都統蒙古王族、收藏家	4
三多	前將軍府際威將軍	
卓定謀	前中國事業銀行經理	
朱延昱	前北洋政府財政部次長	
朱文鈞	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鑒藏家	
陳垣	前教育部次長、中國宗教史學家	
沈兼士	北京大學國門學主任、語言文字學家	
馬衡	古物保管會北平分會主任	
周肇祥	北京古物陳列所所長、畫家	
金開藩	金城之子、畫家	4
劉驥業	前財政部科長、陳寶琛女婿	

7月19日，坂西和渡邊抵達上海²²⁾。上海作為首批被列強叩開的通商口岸之一，海上航運事業的發展促使其成為了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和商業重鎮。由於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裡也是新式美術學校和書畫社團的重鎮。1927年海派領袖吳昌碩逝世之後，以王一亭（1867-1938）為代表的「吳派傳人」引領著上海畫壇。關於王一亭的日本交友圈包羅萬象，從政治人物、實業家、佛教圈、到美術界，他幾乎成了所有日本名流到上海必定拜訪的對象²³⁾。此外，王一亭還有兼藝術贊助人、藝術活動家、畫家和書法家為一體的

22) 1928年7月6日，東京美術學校教授結城素明因公務已先行返回日本。

23) 賴毓芝，〈上海與關西南畫圈的往來：以王一亭為例〉，《中國近代繪畫研究者國際交流集會論文集》（京都國立博物館，

多重身份，在此之前參與了多次中日書畫聯展，為海派藝術的繁榮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坂西和渡邊抵達上海後，亦拜訪了王一亭，日本舉辦唐宋元明展的企劃，得到了王一亭和前交通部部長、畫家、收藏家葉恭綽的大力支持。他們還討論了展會的舉辦流程與出借作品的攝影問題，王一亭為日方展示了所藏丁雲鵬、任伯年、高其佩、錢舜舉等名家的作品。7月27日，王一亭、劉海粟、王濟遠、錢瘦鐵等人在中餐廳「功德林」設宴款待渡邊和坂西。通過王一亭的人脈，日方了解到著名書畫收藏家龐元濟和遠在蘇州的畫家顧鶴逸都擁有不菲的收藏。然而，渡邊和坂西訪華期間，恰逢龐元濟返鄉浙江吳興，不在上海。因此，日方最後委託王一亭和葉恭綽負責借調上海畫壇及其周邊私人藏家的藏品。7月31日，坂西和渡邊從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第一次訪華行程結束²⁴⁾。8月15日，坂西、渡邊、結城三人在外務省匯報訪華報告並與正木直彥、岡部長景商討應對策略，最終決定推舉公爵近衛文磨作為唐宋原名展的會長²⁵⁾。近衛當時作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在政治上負有聲望，近衛與同為華族一員的岡部長景私交甚篤。

如上所述，坂西和渡邊在上海的贊助和借調展品交涉雖然得到了上海畫壇的支持，但是「濟南慘案」後上海的反日餘溫尚存，外交問題懸而未決，反對中國收藏家出借展品的呼聲在新聞報刊中迅速蔓延。著名作家陳小蝶（1897-1989）在《申報》上兩度發表題為〈為東京宋元明書畫展覽會告中國收藏家〉的文章稱：

日本人處心積慮，圖謀我國，萃其野心與謀滿蒙膠濟同。我國收藏家，不能保其國粹，而視為逐利之藪，其罪殆亦與糶米同。吾非謂收藏家人人皆如此，然一二為是行或有是心者則其罪可誅矣。而若輩猶自號曰：扶輪風雅。神州將陸沉矣。若輩豈慮國粹神品為滄桑所淹，而先置之於蓬萊二島間乎？²⁶⁾

今日本又有第三次大舉，而拱北歿久矣。北方勢力亦失，乃折而求南。按其實，乃為日本昭和天皇今秋加冕盛大祝典之一日，名曰（唐）宋元明書畫展覽會。特派坂西、渡邊二氏來滬，向我國收藏家蒐集藏品，運諸東京，同伸普天之慶。夫（唐）宋元明書畫展覽會，不開於中國，而開於日本，已可悲矣。不開於平日，而開於日皇加冕之際。是以我國數百年精靈憑附之神物，而供其優俳也。作者有知，寧不痛悔長號。乃聞一二藝術界，幸二氏之來，聯歡無虛夕，以能步金氏後塵為榮。²⁷⁾

隨著中日國際關係摩擦的加劇，中國畫家個人或者書畫團體與日本的交流也遭到了質疑和批判，尤其是將書畫運往日本，使其成為慶祝昭和天皇加冕大典的展覽活動更是被貼上了政治不正確的標籤。眾多有識之士以此為恥，加之害怕中國文物因此流落異國，收藏家被批判為「居奇壟斷而輸之異國者也」。由於渡邊和坂西首次訪華非但沒有成功借調「故宮博物館文華殿」的藏品，而且也未獲得南京國民政府外交上的承認，1928年9月，坂西和渡邊再次訪華²⁸⁾。坂西抵達上海伊始，《申報》便立刻刊登了名為〈大可注意之，日本坂西中將再度來華、負有重要使命，但託名搜集書畫展覽材料〉的文章，其主要內容如下：

2010)，頁43-67。

24) 〈上海ニ於ケル交渉日誌〉，《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098-0102，Ref: B05016016400（國立公文書館）。

25) 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第2卷），頁613。

26) 陳小蝶，〈為東京宋元明清名畫展覽會告中國收藏家（上）〉，《申報》，1928.8.3（17）。

27) 陳小蝶，〈為東京宋元明清名畫展覽會告中國收藏家（下）〉，《申報》，1928.8.4（21）。

28) 〈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ニ關スル件〉，《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123-0124，Ref: B05016016400（國立公文書館）。

戊辰社云，(前略)昨日，坂西忽又乘日本郵船會社之上海丸來滬，下榻於東和洋行。此來聞又携有田中內閣之重要使命，但坂西極力否認。對於往訪友人，均謂此次來華，並無政治任務。只因東京今秋舉行唐宋元明名畫展覽，特來華搜集出品。至詢以中日條約問題意見，則云：如中國去其非友好之態度，撤回條約廢棄，及適用臨時辦法之主張。而提出新的改約要求，日本當樂於承認，倘若不然，只好各行其是。是這都是日本官場門面語，可見坂西對於時局問題，極力巧避談及，更證其負有重要使命。坂西在滬約勾二三星期，尙須遍歷北平、天津等華北重要都市始行返國。²⁹⁾

此間坂西訪華是否負有政治任務暫且不議，素有「中國通」之稱的他曾經擔任過袁世凱和黎元洪的顧問，在北京滯留長達17年。《申報》上的社會輿論認為坂西的對華意見促使田中義一內閣對華採取了強硬的態度。此外，訪華時坂西還擁有日本貴族院議員和陸軍中將的頭銜，這使得他難免招致社會輿論的嚴厲批判。輿論的影響也迅速蔓延到上海畫壇的收藏家之中，先前同意出借展品的藏家們紛紛表示需要征詢國民政府的意見。在日本駐南京領事館領事岡本一策的斡旋下，坂西前往南京拜訪了國民政府的官僚並獲得了他們的口頭許可。坂西在日本新聞聯合社對他的採訪中說：「蔣介石、譚延闓、李烈鈞、李石曾、薛篤弼、王正廷等均非常讚成，尤其是蔣介石還承諾可以作為展會的贊助人。這應該能收集到中國相當數量的名畫，政府官僚的態度非常友善」³⁰⁾。

除此之外，在渡邊的委託下，王一亭帶著渡邊親筆畫的《孔雀圖》轉送給蔣介石和王正廷。在此說明一下當時王一亭與國民政府的關聯。雖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王一亭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然而1928年春，直隸、山東兩省發生了嚴重的洪災，餓殍遍野之時，他毅然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委任，出任直魯賑災委員會委員，與張溥泉、李石曾、許世英、虞洽卿、陳嘉庚一起負責向海內外籌款賑災³¹⁾。王一亭帶畫找上蔣介石之後，蔣恭敬地回復：「贊助員辱邀，謹當遵命擔任也。此復順頌日祉」³²⁾。外交總長王正廷也回復說：「色香並古渲染皆工，洵藝苑中佳品，拜承嘉恩，歡喜無量，至名畫展覽會並蒙不棄擬加入賤名，坳庸風雅榮幸奚，似專口鳴謝。敬祝時綏，王正廷謹啟」³³⁾。

1928年9月27日，唐宋元明展會長近衛文麿（公爵）向外務大臣田中義一（男爵）提交了12000日元的經費申請書。1928年10月，外務省通過了資助唐宋元明展的方案，決定從「對支文化事業」的經費中抽取12000日元資助展會的籌辦³⁴⁾。此外，展覽會事務局東京美術學校文庫還發佈了《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趣旨書》，對展覽會的規則作了如下規定：

第一條：本會稱為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

29) 〈大可注意之，日本坂西中將再度來華、負有重要使命，但託名搜集書畫展覽材料〉，《申報》，1928.9.15（13）。

30) 〈唐宋元明名畫展に支那からも出品〉，《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129，Ref: B05016016400（國立公文書館）。

31) 沈文泉，《海上奇人王一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99。

32) 〈大正末期より昭和六年に至る日中交流名画展開催に関する渡辺晨畝画伯の活躍について〉，《外交時報》1978年6月第1155號，頁28。

33) 同注32。

34) 〈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ニ對シ助成金補給ニ關スル高裁案〉，《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437-0440，Ref: 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第二條：本會以展覽中日兩國傳存的唐宋元明名畫以及弘揚東方美術之精華為目的。

第三條：本會協同東京帝國博物館秋季特別展覽會，於昭和3年11月24日至同年12月14日在東京上野公園東京府美術館召開。

第四條：本會辦事處設置在東京上野公園東京美術學校文庫，展覽會召開時移至東京府美術館內。

第五條：本會設置如下成員。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委員若干名。會長及副會長推舉發起人，委員推舉會長。

第六條：讚成本會趣旨，援助本會事業的人為贊助人。

第七條：本會的展覽品僅限本會委託出展的作品，本會的出展品全部為非賣品。

第八條：本會將對出展品使用存單登記，其交接手續另定。

第九條：本會將征得收藏者同意對出展品進行拍攝，發行圖錄或者其他印刷讀物。

最終確定展覽會會長為近衛文麿，副會長為清浦奎吾，委員有坂西利八郎、渡邊晨畝、川合玉堂、橫山大觀、竹內棲鳳、都路華香、山元春舉、正木直彥、小堀鞆音、小室翠雲、荒木十畝、菊池契月、結城素明、溝口禎次郎、下村觀山等15人。從以上豪華的陣容可以看出，日本這是將其作為一場國際盛會來籌備的，除了華族和貴族院議員之外，還有著名的文人畫家、帝國美術院會員、「文展」和「帝展」的作家、審查員等。這些成員的頭銜大多數由政府任命，因此在展覽會的表像空間日本所精選出來展覽的繪畫，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國家公認的傑作或者是「正統性」的光環。然而，展覽後續的籌備並非一帆風順，在展品即將運往日本之時卻遭到了中國社會輿論和古物保存會的強烈反對。

三、古物保存會及其反對運動

據《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記載：「11月7日，北平分會函中華駐日公使館就近於日本大典博覽會中注意故宮已佚書畫」³⁵⁾，此處所說「日本大典博覽會」就是指慶祝昭和天皇裕仁登基的唐宋元明展。義和團事件和辛亥革命之後，伴隨著清王朝帝制的動搖和崩潰，在政情不安和軍閥混戰，以及清廢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等背景下，中國文物在動亂中大量流失海外。在1912年溥儀退位至1924年11月溥儀出宮之前的十多年間，民國政府仍然允許他住在皇宮之中並且保留了后妃、宮女太監等宮廷禮儀。龐大的生活開銷使得這位清朝末代皇帝迅速陷入了經濟窘境。同時，由於年輕的共和政府初期政權不穩，溥儀心存復辟清室的幻想，他結交軍閥政要和以日本為主的外國勢力。日常生活和政治上的開銷使得他的財務困境日趨嚴峻，因此變賣故宮的文物成為了他紓解財務窘境的捷徑³⁶⁾。為了迅速將文物變賣成現金並不被外界發現，溥儀以「賞賜」弟弟溥傑和「出借」諸位大人為名，秘密將書畫「盜運」出宮外。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回憶說：

溥傑比我小一歲，對外面的社會知識比我豐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外面活動，只要藉口進宮，就可

35) 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大學出版社，1935），頁168。

36)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集刊》第23卷第1期，2005年，頁8。

以騙過家裡了。我們行動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方法是把宮裡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以我賞賜溥傑為名，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裡去。溥傑每天下學回家，必帶走一個大包袱。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一天不斷地幹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為那時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我就從他們選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³⁷⁾

據內藤文庫藏《故宮已佚書畫目錄三種》中〈賞溥傑書畫目〉條目記載，從宣統14年（1922年）7月13日至12月12日，溥儀賞溥傑偷運出宮外的書畫，囊括了王羲之的墨跡《曹娥碑》、仇十洲《蘭亭修禊圖》、李公麟《五馬圖》、鄭思肖《墨蘭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在內的名作³⁸⁾。溥儀被逐出宮後，北洋政府與清室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清點故宮的財產和古物。隨著〈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古玩等糙賬〉和〈賞溥傑書畫目〉等相繼被發現，善後委員會意識到了溥儀「盜運」故宮書畫規模之嚴重性。對於故宮文物的外流，顧頡剛曾對此事提出過批判：「最近在報紙上，又見清室善後委員會中檢理清室檔案，發現清室向陳列所隨意取其物件，這真是豈有此理」³⁹⁾。後來，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張繼曾在工作匯報中感歎道：

二十世紀以來，歐美學者，競以東方學術相號召，不惜重金購致吾國古物。奸商嗜利，搜求盜以供其求，古剝荒丘頓遭浩劫，重要史料，公然視為貿易之品。尤有甚者，外人深入腹地，自動採集，假調查學術之美名，組巨大規模之團體，在政府協助之下，任意捆載以去。他不具論，敦煌石室之寶藏，其最著者也。⁴⁰⁾

因此，在上述中國文物面對如此嚴峻的「內憂」和「外患」背景之下，雖然渡邊和坂西兩度訪華後獲得了各大收藏家出借展品的許可，但是當展品開始運往日本的時候則受到了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的警覺與反對。古物保管委員會於1928年3月由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會址設於上海，隸屬於中華民國大學院（首任院長蔡元培），該委員會由張繼（主任委員）、蔡元培、朱家華、馬衡、顧頡剛、胡適、李煜瀛、沈兼士、翁文灝、袁復禮、李濟、張人傑、陳寅恪、李四光、徐炳昶、傅斯年、徐悲鴻、林風眠、易齋、易培基、李宗侗、高魯、劉復等23人組成。1928年6月，國民政府接收故宮文物之後成立了「北平文物保管會」，以取代當時的民間組織「北平文物臨時維護會」。為防止古代名畫流落日本，1928年11月9日，《申報》報道了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請求扣押文物運往日本的聲明：

東方八日北平電：以近衛文磨公爵為會長之日本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因坂西中將之斡旋，借用中國民間收藏之名畫。自本月二十四日起，在帝室博物館，并東京府美術館展覽三星期，作為御大典

37) 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華書局，1977年），頁234。

38) 北平故宮博物院，《故宮已佚書畫目錄三種》（故宮博物院，1931年），頁1-26。

39) 顧頡剛，〈古物陳列所書畫憶錄〉，《現代評論》1925年第1卷第19期，頁13。

40) 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頁1。

之紀念。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對於此事，特請北京政治分會出令扣留此項名畫，以免流入外人之手云。⁴¹⁾

可見，古代名畫運往日本公開展覽，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持強烈反對的態度。對於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反對，日本一時輿論嘩然。日本《萬民新聞》將其報道為中國政府干涉唐宋元明名畫展並阻止中國名畫的日本之行：「因懼怕千百年來中國美術之精粹被賣渡到國外，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持公文建議北平政治分會命令各海關截留名畫展覽會的展出物品（筆者譯）」⁴²⁾。雖然社會上的反日輿論愈演愈烈，然而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干涉行動的實際成效並不顯著。日本方面為了讓展品順利運達東京採取了各種應對措施。首先，在排日運動的風口浪尖上，為了消除中國藏家們受到的輿論壓力，日方承若有疑慮的藏家可以不公開展出者的姓名。其次，由於古代名畫價格高昂，甚至有單件超過二三十萬日元的作品，繪畫的運輸工作交由外務省負責，同時給運往日本的名畫附加保險，保價運輸，保險總額高達百萬日元⁴³⁾。此外，日本先前通過王一亭的牽線獲得了蔣介石和王正廷的讚同，繪畫作為「非賣品」，國民政府下達了無需檢查和免除稅收的許可⁴⁴⁾，因此，北京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干涉活動宣也告失敗。

最終出借的展品共有300多件，其中北京145件、上海98件、天津76件、大連20餘件。1928年11月14日，北京和天津的展品首先抵達神戶，由東京美術學校文庫主任北浦大介負責收取，展品中有包括傳為閻立本、王維、宋徽宗、蘇東坡、馬遠、夏圭、董源、倪瓚、戴進、文徵明、董其昌等古代名家的作品⁴⁵⁾。據展覽會中方委員關鐸介紹，這些展品悉數來自私人藏家，大多數展品為首次公開展覽，出展者共有約40人，展品中有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宋馬遠《水墨山水》等精品⁴⁶⁾。

四、赴日的中國團體

1928年11月6日，外務省文化事業部通過了資助中國名士赴日參加唐宋原名展的方案，決定從「東方文化事業特別會計事業費」中支出15500圓資助赴日的中國團體，具體名單和金額如下表所示⁴⁷⁾。

41) 〈(北)平古物保管會請扣運日古董〉，《申報》，1928年11月9日(21)。

42) 〈支那名畫の日本行を阻止〉，《萬民新聞》(1928年11月8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239，Ref: B05016016600(國立公文書館)。

43) 〈御大禮記念として催さる々唐宋元明名畫展〉，《美術日報》(1928年10月25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363，Ref: 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44) 〈支那名畫展委員會來朝 けふ長城丸で〉，《大阪毎日新聞》(1928年11月18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364，Ref: 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45) 〈唐宋元明時代の古名畫展覽會いよ〈開催〉〉，《美術日報》(1928年11月15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363，Ref: 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46) 同注41。

47) 〈支那名士ニ本邦視察手當補給方ニ關スル高裁案〉，《唐宋元明畫展覽會關係 支那名士本邦視察》，頁0279-0295，Ref: B05015742800(國立公文書館)。

表2 資助名單及金額明細

城市	姓名	頭銜	金額(圓)
北京	溥儒	恭親王奕訢之孫	1000
	關冕均	前京綏鐵路局長	1000
	郭葆昌	前九江稅關監督	1000
	袁勵準	前清內務府官吏	500
	熙鈺	前清都統	500
	關鐸	前司法部總務廳長	800
	劉驥業	前財政部科長、陳寶琛外甥	800
	金開藩	金城之子	500
	中根齊	前農商部參謀、日語翻譯	500
	橋川時雄	《文字同盟》雜誌主筆、日語翻譯	400
天津	張弧	前財政部長	1000
	方若	天津《日日新報》社長	1000
大連	蒯壽樞	前留日學生督導	500
	梁鴻志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中國委員	500
	李文權	前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教師	400
上海	龐萊臣	實業家、畫家、收藏家	1000
	狄楚青	前上海《時報》社長	500
	王一亭	實業家、畫家	1000
	王季眉	畫家(王一亭之子)	500
	潘曾蔭	實業家	500
	李盛鈞	李平書之子	500
	王芑蓀	日語翻譯	300
	李擇一	李宣龔之弟	500
飯島政男	日語翻譯	300	

從上表可知，前往日本參加展覽的中國人藏家及相關人員主要為北京、天津、大連、上海等地的代表。上述人員中，除了溥儒、郭葆昌、袁勵準三人放棄赴日之外，關冕均、王一亭、李文權、張弧等人先後抵達日本⁴⁸⁾。11月24日上午十點，唐宋元明名畫展在東京府美術館舉行開幕式，岡部長景、汪榮寶、正木直彥、山本悌二郎、張弧、王一亭、小室翠雲等代表列席。

五、凝視中國：《歷代帝王圖》的流出

展覽會開幕式之後，《東京日日新聞》《萬朝新聞》《朝日新聞》等日本的新聞報刊大幅報道了這場轟動的展覽，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梁鴻志(1882-1946) 出展的(傳)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現藏波士頓美術館)，日本媒體將此圖與1903年流入大英博物館的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相提並論⁴⁹⁾。梁鴻志，號眾異，齋號爰

48) 〈在本邦ノ部 4. 唐宗元明名画展覧会〉,《各国美術展覧会關係雜件》,頁0361-0364, Ref: B04012280700 (國立公文書館)。

49) 同注43。

居閣，福建長樂人。祖父是清朝學者梁章鉅（1775-1849），外祖父是山西布政使林壽圖（1821-1897）。梁曾任段祺瑞臨時政府臨時執政秘書長以及「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中國委員。1920年7月，直皖戰爭皖系敗北，梁鴻志被通緝，隨後他多次避居天津日租界。1928年國民黨北伐勝利後，他又逃到大連隱居。關於此圖的遞藏情況，該圖卷末處有一段梁鴻志外祖父林壽圖寫的題跋：「同治丙寅九月朔，棣兒生之日，購得此卷。他日長成，其知寶藏否。林壽圖識於西安藩署。」從跋語可知，林氏於1866年購入此圖。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將此圖以珂羅版複製，書名為《唐閻立本帝王圖真跡》，署「閩中林氏藏」。

在林氏之後，梁鴻志獲得此圖的過程則略顯傳奇。梁氏避居天津期間，傳聞他從親戚手中廉價騙購了唐閻立本《四夷朝貢圖》，高價售與日人岩崎氏，獲利30萬元。據中華書局徐俊先生考證⁵⁰⁾，這則傳聞與事實略有出入，首先與梁氏有關的不是閻立本《四夷朝貢圖》（即《歷代職貢圖》，現藏台北故宮），而是名氣更大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梁氏在該圖上題寫了一行跋文：「爰居閣無上珍秘，共和乙丑秋日，梁鴻志題識。」題跋行側鈐「眾異珍藏」朱文印、「梁鴻志」白文印，題識時間為1925年秋天。綜合上述可以推測梁氏購藏此圖的時間範圍應該是在1917至1925年之間。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梁鴻志復出任段祺瑞臨時政府臨時執政秘書長，積極執行親日政策。1925年段倒台之後，梁先後輾轉天津、大連、上海、杭州等地。1926年8月至9月，梁與友人兩度觀賞此圖並有如下兩行跋文：

丙寅八月二十有六日，沈瑞麟、湯漪、姚國楨、姚震、張伯英同觀於爰居閣，伯英記。

丙寅秋九月二日，偕胡錫安敬觀於爰居閣，長洲章保世書款。

除此之外，篆刻家陳巨來在〈趙叔孺先生軼事〉一文中對此圖曾有一段回憶：「昔商務印書館曾有珂羅版印之出售也。後為梁眾異給去，盜賣於日本博物館矣。時為民初，聞得價十四萬元，梁只給林氏以六萬元，後為林氏所知，遂與林斷絕關係了」⁵¹⁾，1928年唐宋原名展之時，《歷代帝王圖》的所有者仍為梁鴻志，據此可知陳氏回憶中的「盜賣於日本博物館」「時為民初」等記載有誤。當時梁鴻志曾欲通過美術商原田博文堂斡旋，先後向收藏家住友寬一、實業家阿部房次郎兜售此圖，但因價格問題未能成交⁵²⁾。1929年1月，美術史學者相見相雨和古董商江藤濤雄找上正木直彥，江藤提出若有人願意以8500圓將梁鴻志所藏的《歷代帝王圖》購入的話，他可從中斡旋⁵³⁾。1931年4月至5月，梁鴻志再一次前往日本參加宋元明清名畫展覽會，在這次展覽中梁並沒有將此圖拿出來展覽，而是將其出售給了美國畫家、哈佛大學藝術史教授、收藏家兼贊助人丹曼·羅斯（Denman Waldo Ross, 1853-1935），羅斯將它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至此這一名蹟流落美國至今。日本藝術界曾為錯失收藏此圖的機會而感到痛惜不已，日本帝國美術院附屬研究所研究員正木篤三（1905-1950）曾感歎道：「資金雄厚的波士頓美術館如今又添一名蹟，這勢必會使其聲名大噪吧！然而震驚的是傳聞羅斯以及其低廉的價格將其購入，不得不說錯失名蹟對我國美術界來說真是太可

50) 徐俊，〈附逆之外的梁鴻志：爰居閣譚屑〉，《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24日）。

51) 陳巨來，〈趙叔孺先生軼事〉，《安持人物鎖憶》（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頁21。

52) 鶴田武良，〈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中國明清名畫展》（日中友好會館，1992）。

53) 正木直彥，〈十三松堂日記〉（第2卷），頁613。

惜了（筆者譯）」⁵⁴。

《歷代帝王圖》在1928年展出後名噪一時，該圖描繪了從西漢昭帝至隋煬帝共13位帝王的英姿，是一幅長達5.31米的大型長卷，卷宗上留有米芾、錢明逸、韓琦、富弼、周必大、翁方綱等人鑒賞或者觀賞的跋記。日媒將其報道為「場內第一名品，人氣非凡」⁵⁵，李文權亦在採訪中說：「該圖時價25萬圓，保險10萬圓，是中國唯一閻氏手筆的國寶……《歷代帝王圖》相當秀逸，中國古代的作品用色不同於近來的日本畫與洋畫，不易褪色，是威風凜凜的傑作，確實刺激了日本畫壇（筆者譯）」⁵⁶。日本媒體渲染下的《歷代帝王圖》成為了中國古代盛世的代表作之一，作為極少數以帝王人物來表現繪畫主題的藝術作品，其描繪的歷代帝王形象在日本帝國主義和皇國史觀高漲的年代，配合上「昭和大典」的一系列儀式，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日本皇權觀念的宣傳起到了助推作用。

雖然當時該作品被視為閻立本的真蹟，但是據富田幸次郎（1872-1938）研究，該畫卷絹質殘破，曾經後人修補且畫卷前後兩段的絹質不同，難以確定後段是否為閻立本所作，但是應為7世紀的作品；前段應是根據後段圖像摹作，且成於約11世紀之前⁵⁷。現今有史學家認為該畫卷全卷都是宋代的摹本，原作者不是閻立本，應該是初唐的郎餘令（約活動於7世紀前半期）⁵⁸。實際上，早在展覽之前的1926年，這幅作品就在內藤湖南（1866-1934）的中國美術史講座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他發表在《佛教美術》的論文中指出，該圖未見於《宣和畫譜》，但是從帝王的服飾以及著色來看，可以說這是一種唐畫的畫風。他認為該圖與法隆寺舊藏的聖德太子像都出自唐代的肖像畫傳統，雖然無法判定該圖是否為真蹟，但是總覺得這是匯集了傳稱肖像而摹寫的一幅作品。在查閱了《庚子銷夏記》、《青霞館畫論絕句》、《書畫鑑影》等資料以及觀察了畫作的顏料和墨色之後，他認為該圖有一部分為後人的補筆，即使不是補筆的部分也能看出這是北宋時期的筆法特征，因此他下結論說這應該是宋初的臨摹本⁵⁹。

六、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檔案和相關新聞報刊報道等資料為線索，考察了以唐宋元明展為契機，中國古代名畫渡日展覽的曲折經過。此外，還重點梳理了（傳）閻立本《歷代帝王圖》被觀看、研究及其遞藏的經過。相較於此前的中日繪畫聯展而言，唐宋元明展是民國時期中國古代繪畫在日本首次大規模的展出，其展品主要由室町時代以前傳到日本的「古渡」繪畫、辛亥革命前後傳到日本的「新渡」繪畫以及中國民間私人藏家的藏品構成。

54) 正木篤三，〈内外彙報 帝王図卷ボストン美術館に帰す〉，《美術研究》1932年第5號，頁19-20。

55) 〈支那四代の藝術の香り高く〉，《日日新聞》（1928年11月25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369，Ref：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56) 〈日本畫壇への大きな刺戟 中に輝く歷代帝王圖〉，《日日新聞》（1928年11月20日），收錄於《展覽會關係雜件》第四卷，頁0369，Ref：B05016016700（國立公文書館）。

57) Tomida Kojiro, "Portraits of Emperors: A Chinese Scroll Painting Attributed to Yen Li-pen (died A.D. 673),"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vol.30 (1932), pp.2-8.

58) 金維諾，〈《古帝王圖》的時代與作者〉，《中國美術史論集》（明文書局，1984年），頁149-156；陳葆真，〈圖畫如歷史：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研究〉，《美術史研究集刊》2004年第16期，頁1-48。

59) 內藤湖南，〈唐朝の繪畫（上）一（支那繪畫史講話 三）〉，《佛教美術》1926年12月第9號，頁2-14。

由於古物保存會以及故宮博物院拒絕出借展品，加上中日政局動蕩等原因的影響，在此種情況下中國私人藏家出借的展品玉石混淆，良莠不齊成為了唐宋元明展最大的問題。日本美術史家田中一松（1895-1983）在《中央美術》雜誌上發表展評說：「想來中國原本是一個藝術大國，但無奈也是一個偽作之國。放眼望去，在茫茫流沙之中有誰能從中淘出屈指可數的真金呢？與此相反，日本的出展虽也不能說全都是精品……（筆者譯）」⁶⁰。在中國出展的作品中，田中僅對《歷代帝王圖》一筆帶過，對明清的文人畫隻字未提。同時，在日本出展的作品中，田中又刻意迴避了「新渡」的中國繪畫，卻對《真言五祖像》（東福寺藏）、《十六羅漢圖》（東博藏）、（傳）牧谿《漁村夕照圖》（根津嘉一郎藏）、（傳）馬遠《風雨山水圖》（岩崎小彌太藏）、（傳）夏圭《江頭泊舟圖》（岩崎小彌太藏）等「古渡」中國繪畫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岡倉天心和他的老師費諾羅薩（Fenollosa, 1853-1908）為代表的藝術史家猛烈地抨擊在元明兩代上升到主導地位的文人畫。1921年，有賀長雄翻將費諾羅薩的著作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以《東亞藝術史綱》之名翻譯出版。該書出版之後，瀧精一（1873-1945）將其作為東京大學日本美術史的授課教材。田中自1918年9月至1923年3月在東大就讀於美學美術史學科，他曾指出學生時代受到了費氏著作中精密推論的啟發，費氏的文人畫批判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其論點也在書中展現的淋漓盡致⁶¹。由此可見，田中對日本「古渡」繪畫的這種「偏愛」與「偏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費諾羅薩「推崇唐宋，貶低元明」藝術史觀的影響。囿於篇幅原因，本文尚未對唐宋元明展的諸多展品及其特徵、日本文藝界對中國繪畫的「理解」和「誤解」等問題進行詳細的論證和分析，以上問題將作為今後的課題另撰文闡釋。

付記：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青年項目「近現代中國書畫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CF180。

60) 田中一松，〈支那古名畫展を觀て〉，《中央美術》1929年1月第15卷第1號，頁115。

61) 田中一松，〈フェノロサ著改訳の新刊本完結の喜びに寄せて〉，《田中一松繪畫史論集》（下卷）（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6），頁367-370。

